

臺灣社會學刊，2004年12月
第33期，頁157-199

研究議題討論

文化、構框與社會運動*

何明修

* 何明修 紐約大學社會學系富爾布來特訪問學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 (msho@mail.nhu.edu.tw)。本文的研究與撰寫使用國科會計劃 (NSC 92-2413-H-343-002-FG) 的資源。作者感謝編委會及匿名審查者的指教意見，對於陳麗如、蔡佳憇、蕭長展的編輯協助也一併致謝。

收稿日期：2004/2/19，接受刊登：2004/10/11。

中文摘要

以往社會運動研究者重視動員結構與政治過程，在九〇年代以來，社會學家開始注重社會運動與文化的關係。在既有分析途徑中，構框理論是廣為普遍運用的一種。構框是指建立一套詮釋外在世界的架構之過程，亦即是社會運動如何生產出文化的意義。本文探討，Snow 等人一開始如何以互動論的理論預設來提出構框理論。在早期的看法中，構框是訴諸於支持者，而其主要作用在於形塑動員共識。相對地，構框的策略性與組織性面向則是較少討論。本文贊同構框理論應該擴展其研究範圍，納入策略與組織的考量。因此，構框除了強化參與者的動機以外，其策略性運用更可以用來（1）利用政治輿論、（2）維持參與士氣、（3）減少反對阻力。組織性構框方面，構框過程是受到組織動態所影響，包括競爭、合作、學習等因素。本文接受策略理性的預設，但是也主張應該避免過度的志願論立場。社會運動的理性是高度受限的，是受制於當事者的傳記背景、政治文化、構框劇碼等條件的限制。基本上，本文認為構框理論的發展潛力仍值得開發，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處理當前研究的一些歧異，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將會更有累積性。

關鍵詞：構框、文化、社會運動、策略

Taiwa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 Dec. 2004, 33: 157-199

Culture, Framing and Social Movement

Ming-sho Ho

Department of Applied Sociology, Nan Hu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uthor offers a review of studies on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Framing is defined as a) a collective process for building a shared interpretative schema for the outside world, and b) the means by which social movements produce cultural meanings. This paper traces the interactionist standpoint used by David Snow and his colleagues to establish their framing theory. In the early phase, framing studies primarily focused on small circles of potential supporters and their capacity to create a consensus. Earlier studies tended to under-theorize the strategic and organizational dimensions of framing. In more recent scholarly works, framing can be conceptualized as making use of political opinions, maintaining participant morale, and avoiding resistance. Recent studies also show the extent to which framing is subject to organizational processes such as competition, cooperation, and learning. While endorsing the strategic aspects of framing theory, this review also warns against excessive voluntarism. Rationality in framing is bounded by the actors' biographies, histories, and pre-existing cultural repertoires. If some conceptual difficulties can be resolved, framing theory is a promising explanatory approach to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movement and culture.

Key Words: framing, culture, social movement, strategy

一、前言：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

在晚近，社會運動研究者的注意力開始轉向文化層次的分析。學者注意到這個事實，社會運動不僅是挑戰既有的權力與資源的分配方式，同時也在宣傳一套嶄新的文化訊息，要求實踐某種社會生活的可能性。換言之，社會運動不只是訴求生命機會（life chance）的重新分配，而是涉及另類生活風格（life style）的承認。社會運動是有創意與想像力的，它要求改造我們的日常生活，甚至是關於我們如何看待自我。同時，隨著各種傳播媒體的發展，文化符碼的生產與消費急速成長，也使得意義本身具有高度的反思性格。意義越來越是人造的，而不是自然的，也因此開啓了文化政治的多樣可能性，社會運動不可避免地捲入這種關於意義的集體形塑過程中。正如 Touraine（1977: 48）所指出，一旦我們拋棄傳統的先驗概念，例如上帝、民族、天性等等，社會的自我生產（self-reproduction of society）就成爲一種具有高度反省性的過程，社會運動很難不在其中扮演一個重要角色。

除了外部環境的變動，學術研究發展的趨勢也是一項原因，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轉向也是受到整個社會學典範移轉的影響。Jasper（2003）指出，社會學的發展經常是圍繞著一組對立的概念，八〇年代是理性選擇學派的崛起時期，文化的關注也是同時期另一項可觀的發展。在社會運動的研究中，如果說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大致上是依循著理性選擇學派的基本預設，亦即將社會運動視爲一種有組織與目標的集體行動，那麼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也就成爲另一種既互補又相競爭的取向。誠如 Alexander（1998: 30-32）所強調的，文化社會學的一個基本構想即是「認真看待意義」（taking meaning seriously），承認意義是具有相當的運作自主性，而不能只被當成組織、利益、策略的附屬品。在任何的社

會生活中，我們是透過意義來組織我們的世界觀，包括了我們是如何理解與評價外在事物，而不是直接面對未經過詮釋的事實，用 Gusfield (1981: 51) 的話來說，我們總是處於「符號森林」中。文化社會學強調這些符號的可塑性與歷史性，社會運動則是實際展現了文化如何在集體挑戰中被創造出來。

要說明的是，重視文化的自主性並不意味著接受某種觀念論的立場，認為理念元素總是獨立地發揮其因果作用力，決定其他社會領域的發展。事實上，意義的問題總是附著在組織、利益與策略之上。分析文化元素與非文化元素的互動，而不是將其中一方化約為另一方，則是研究者的重要任務。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說，文化的建構性固然容許了行動者的主動性格，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毫無限制的自由。在社會運動提出文化訴求之前，集體行動者即是面對了一連串的歷史傳統、集體記憶、政治文化的前提，而且這些素材並不是他們所選擇的。用文學的術語來說，社會運動的文化創造並不是「無中生有」(ex nihilo)，而是「從事物之中開始」(in medias res)。因此，「認真看待意義」並不意味著「只認真看待意義」，承認文化的相對自主性，也不代表視其為一套封閉的、獨立自足的領域。

從文化社會學的角度來審視社會運動，首先會面臨的問題即是我們擁有太多的分析概念，它們之間是彼此高度關聯，但是卻又源自於不同的理論傳統。從古典的意識型態、階級意識、卡理斯瑪、文化霸權，到後現代主義者偏好的論述、符碼等概念，都提供了相當的洞見，能夠用來剖析文化與權力的糾葛。另一方面，由於社會運動研究越來越成熟，研究者也創造或引用了新的概念，包括了抗議劇碼 (protest repertoire)、認同 (identity)、工具箱 (tool-kit)、共識動員 (consensus mobilization)、以及本文所要討論的構框 (framing)。

所謂的框架（frame）一詞，是指「一種簡化與濃縮『外在世界』的詮釋架構（interpretative schemata），其方式是強化與符碼化個人環境中的對象、情境、事件、經驗與行動順序，無論是過去的或當前的」（Snow and Benford 1992: 137）。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運動的核心工作之一即是提出一套重新認知世界的參考座標，以喚起參與者的熱情與信念。這套理論預設了一點：任何被壓迫者並不是直接地經驗了被壓迫的事實，能夠單獨地將其指認出並且視之為不義的，從而採取批評的與反抗的態度。如果沒有新的詮釋，改變既有的集體認知，社會運動就很難產生。在此，構框（framing）一詞是泛指這種建立集體行動框架的過程，而所謂的框架設定（frame alignment）則是特指連結個體與社運組織認知框架的行動（Snow et al. 1986: 464），因此是涉及了人際層次的互動。本文採用構框理論（framing theory）的名稱，以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建構是一種動態的過程（相對於框架），而且不只涉及了內部支持者的動員（相對於框架設定）。

構框理論的靈感是來自於Goffman的《框架分析》。Goffman將框架視為一種組織日常經驗的原則，提供諸多的情境定義類型，以協助人們處理各種互動情境（Goffman 1974: 10-11）。在八〇年代中期，構框的概念被Snow、Benford等人引進社會運動的領域，後來陸續被其他學者所借用，成為了當前研究必備的學術字彙之一。大量的集體行動構框研究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社會運動與文化的多樣關係，不過，在這個擴散過程中，概念原先的嚴謹性與精確性被稀釋了，不少研究作品都夾帶了一些原先所不存在的理論元素。因此，學者對於構框概念的分析價值出現了歧異的看法。Benford and Snow（2000）的文獻整理與批判雖然初步釐清了一些概念上的問題，但是仍無法完全解決若干關鍵性爭議。

在此，本文主張採取理論歸納的途徑，以釐清這些概念性的爭議，

亦即是從既有的研究文獻中，整理出共同的經驗發現，進而區辨出構框理論所能分析的議題與層次。更具體而言，本文的目標在於：（1）說明 Snow、Benford 等人的互動論取向的構框理論；（2）探討構框的策略性意涵，以及過度志願論的危險；（3）釐清組織間的構框過程。基本上，本文認為構框理論的發展潛力仍未被窮盡，如果能夠有系統地處理當前研究的一些歧異，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將會更有累積性。

在此，有必要說明構框與其他相關概念的關係。對於實際的經驗研究者而言，諸多的分析概念固然提供了選擇方便性，可以針對研究對象的特殊性量身打造一套分析架構。然而，由於不同概念之間的微妙差異，如果缺乏批判性的使用，就容易造成研究作品之間無法對話或累積，社會運動的文化研究也變得零碎化。在此，本文不打算處理社會運動研究領域以外的概念，因為它們已經越來越少在晚近的研究作品中使用。儘管如此，在進入構框理論的討論之前，本文仍要簡單地處理這些相關的概念，以避免誤解。

首先，根據 Tilly（1978: 151）的定義，抗議劇碼是反對者所能採用的抗議形式之總合。劇碼的組成是受到文化背景的影響，在任何一個時空脈絡中，能夠容許的劇碼必定是有限的，因此現代人往往無法理解傳統的抗議形式。劇碼的概念預設了一種以互動關係為核心的分析途徑，抗議者是選擇性地出招，以呈現他們的不滿。劇碼的概念強調了社會生活中的表演特性，抗議活動實際上是一種角色扮演，也因此可以用來進一步分析社會運動的戲劇學面向（Benford and Hunt 1992）。

其次，認同的概念強調了社會運動中的自我問題。認同是一種個體與集體之間的連結。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參與者學會了一種重新看待自我與他人關係的方式。對於新社會運動理論而言，認同形塑並不是社會運動的副產物或是手段，建立一套新的世界觀本身即是社會運動

的目的 (Cohen 1985; Melucci 1996)。對於其他學者而言，認同是內在於所有的社會運動，它只是社會運動所追求的目標之一 (Calhoun 1993)。無論如何，認同的概念凸顯了社會行動的價值面向，換言之，利益一致性並不必然導致社會運動，要促成集體行動的產生，規範的引導也是必要的。

人們總是在遇到問題時，才會想到去翻工具箱，設法從其中找到最適用的零件；將文化視為一種工具箱即是意味著一種行動取向的觀點，文化並不是由外而內 (outside in) 決定了行動的軌跡，而是行動者用來解決問題的方式 (Swidler 1986, 1995)。從這個觀點來看，社會運動即是人們解決現實問題的方式之一，而且是拼湊了各式各樣零件而成的。因此，即使是面對相同的民怨，同樣一套文化工具箱也可能產生相異的社會運動。

最後，爲了將資源動員論的分析擴展至社會心理學層面，學者創造了共識動員的概念。根據 Klandermans (1988, 1992) 的說法，行動動員是指匯集外在資源的過程，而共識動員則是爲了建立參與者之間的共享意義。如果沒有共識動員的過程，同一群的被壓迫者也不會有參與集體行動的動機，也不可能有後續的行動動員產生。共識動員強調社會運動的意義是需要被經營出來的，而不是某種事先就存在的事物。

劇碼、認同、工具箱、共識動員的概念都強調意義的建構性質，而不是直接反應了某種既存的文化或本質。社會運動具有創生的 (emergent) 特性，應該被視為新社會誕生的預兆，而不是舊社會瓦解的後果。此外，這些概念也共同預設了社會運動的意圖性，參與者是有意識地創造運動中的文化。總體來說，這些概念的提出是反映了七〇年代以後的主流研究趨勢，亦即是以行動、而非結構的觀念來探討社會運動 (Klandermans et al. 1988)。

乍看之下，這些眾多的分析概念的確令人眼花撩亂，但是事實上，它們分別側重不同的社會運動文化面向，其指涉內容並不是完全地重疊，更不是可以相互替代。本文所要探討的構框概念也是具有以上的特性，除此之外，構框對於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仍有下列的意義。第一，構框一詞強調看事物的方式是人為建構的結果，而不是自然而然的。社會運動之所以能夠挑戰既有的體制，原因之一即是在於它提出了某種新穎的觀點，能夠使以往被習以為常的壓迫成為是有問題的，而且有可能被改變。就這一點而言，構框蘊涵了其他相近的概念，運動認同可以被視為成功構框的產物，共識動員的概念幾乎完全可以被構框所取代。第二，構框概念在晚近的研究作品中大量使用，已經累積了相當豐富的成果。因此，McAdam等人（2001: 14-15）認為構框是古典社會運動研究的四大核心議程之一（其他三者分別是動員結構、政治機會、及抗爭劇碼）。由於構框概念的涵蓋性與普遍運用，本文將探討這套理論的分析用途。

二、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互動論的基本預設

在社會運動研究中，構框的概念總是與David Snow連結在一起。在將近二十年的學術生涯中，Snow與其同事共同發展了這套理論，並且運用於各種的社會運動研究中。作為一篇文獻探討，本文有必要回溯Snow等人的理論發展，並且尋找當前若干爭議的源頭。起初，Snow等人是關心人際互動情境下的意義建構問題。用他們的話來說，構框理論一開始即是要處理微觀動員（micromobilization），亦即人際網絡中的運動動員過程。有三個理由可以解釋構框理論為何是以微觀研究前提作為出發點。

首先，Snow 本人在轉向社會運動研究之前，主要的學術興趣是在新興宗教運動。新興宗教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即是為何某些人會拋棄原先的想法，改信某一種宗教學說。事實上，研究信徒的改宗（conversion）是與研究社會運動的招募（recruitment）十分接近，同樣是重視人際網絡對於個體內心世界的影響。更重要的，很少人是為了獲得實際物質利益而轉變信仰，大部分的情況是爲了某種意義的追求。也因此當有宗教研究背景的 Snow 轉入社會運動的研究，他適時地掌握了學界對於資源動員論的不滿氣氛，成功地將人際網絡與意義的問題導入。

其次，在正式提出構框理論之前，Snow 就開始質疑以前社會運動研究的兩點預設，亦即個體主義與功利主義。

根據個體主義的預設，要探討社會運動參與問題即是要從個體的決策出發。在 Olson 的個體經濟學模型下，參與問題被簡化成爲個體的成本效益分析，決策當事者是獨立進行判斷，而沒有他人的介入。另一方面，從傳統社會心理學的觀點來看，參與的問題則是被化約成爲個體心理狀態的探討。在 Snow 等人看來，這一類的分析方式都是忽略了社會網絡的重要性，試圖從個體的稟性（individual disposition）來探討所謂的結構可及性（structural availability）（Snow et al. 1980: 792-794）。在實際的研究中，他們發現，社會運動的招募依循著各種微觀結構管道（microstructural avenues），包括朋友、親人、同學、同事等關係。事實上，一旦將研究焦點放在無所不在的社會網絡，就可以同時避開先前研究的雙重困境：經濟學模型設定理性個體，結果集體行動不容易產生；社會心理學分析則是將參與貶爲病態心理的後果。從社會網絡的觀點出發，Snow 等人強調，促成運動招募的元素是與「參與志願組織、救助行爲、看醫生、找工作等」相類似（Snow et al. 1983: 118）。

早期資源動員論從個體理性計算來思考運動參與的問題，這即是一種功利主義的預設（Fireman and Gamson 1979; Hirschman 1982）。Snow 等人強調，大部分的社會運動參與者都是被邀請而來的，人們很少單獨地自願加入某個團體。因此，參與動機並不是事前存在的，而是某種社會互動的後果。就這個觀點而言，分析社會運動的參與應該是問「如何」（how），而不是「為何」（why）的問題（Snow et al. 1980: 795, 799）。換言之，正是在社會網絡所提供的互動情境下，社會運動參與的動機才能被激發出來。因此，動機並不一定是早於參與，更不是社會運動的必然前提，事實上，參與的動機即是在社會互動中所建構出來的。只不過，在正式轉向構框理論之前，Snow 等人一直無法更詳盡地說明社會網絡所提供的實質作用。

第三個使得構框理論高度依賴互動論預設的理由是 Goffman 本人的研究興趣。Goffman（1974）的探討問題焦點是直接源自於 W. I. Thomas、William James、Alfred Schutz 及 Harold Garfinkel 的微觀社會學，亦即行動者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建構出諸多層次而又秩序井然的情境定義。Goffman 指出，正是由於各種框架的存在，日常生活才成為可以理解的。功能論者主張，文化系統具有某種的因果優越性，能夠決定行動者的意圖，相對地，Goffman 認為框架並不是由外而內地加諸於個體之上，行動者在各種情境中不斷協商、甚至是顛覆框架。同樣一句話可以用來描述、諷刺、嘲笑、欺騙等不同的作用，這顯示了框架的彈性，可以用來處理諸多層次的日常互動，更是展現了行動者的意義創造能力。因此，微觀社會學展現了行動者本身所具有的主動性，他們不應視為某種 Garfinkel 所謂的文化笨蛋（cultural dope）。

儘管如此，Goffman 顯然缺乏對於互動秩序（interaction order）以外的理論關懷，他拒絕討論框架與鉅觀層次的社會過程之關係。有些持

同情立場的評論者強調，Goffman的研究是有系統性，可以進一步整合其他社會結構的討論，但是這並非Goffman本人的興趣（Giddens 1987: 109-139; Collins 1982）。在構框理論中，Goffman十分謹慎地將研究範圍設定在日常經驗的構成，或者所謂「經驗的組織」（organization of experience），而不是「社會組織與社會結構」。他更宣稱，社會結構的研究可以完全不用提到框架本身（Goffman 1974: 13）。Goffman所沒有處理的即是「經驗的組織」與「社會的組織」的關係。如此一來，面對面互動層次以上的構框過程即是被忽略，而這一點正是社會運動研究者所經常面對的。可以如此設想，在支配情境中，被支配者所擁有的「經驗的組織」是呼應了外在的「社會的組織」；在社會運動的動員過程中，反對者試圖提出一套新的「經驗的組織」以挑戰既有的「社會的組織」。¹因此，社會運動的研究關切正好是兩種組織方式的辯證互動。

因此，由於先前的研究旨趣與Goffman的理論取向，Snow等人所提出的構框理論一開始就是以面對面情境下的微觀動員為探討對象，不少的概念設計也是以此為目的。在Snow等人（1986）的文章中，主要探討的問題在於如何將民怨重新帶入微觀動員的討論之中。他們強調，民怨本身是需要被詮釋的，而不是自然而然就存在的。因此，重點並不是客觀情境的改變，而是觀看情境的方式之改變。所謂的框架設定作為一種連結個體與社運組織的方式，即是為了要說服潛在參與者接受某種

¹ 馬克思曾指出，握有物質生產工具的階級也控制了精神的生產工具。換言之，在既定的統治秩序下，被統治者是以一種符合統治者利益的方式來認知外在世界與他們自己。被統治者可能認為自己的不幸處境是「命中註定的」，統治者的特權則是「天經地義的」。在這種情況下，「經驗的組織」是呼應了某一種「社會的組織」，理所當然，只有當被統治者「經驗的組織」改變了，他們獲得了認同與自信，不公正「社會的組織」才能被挑戰。

觀看的方式。因此，建立分享的意義是運動參與的必要條件，而共同的框架則是人際互動的產物（*ibid.*: 467）。

Snow 等人進一步豐富化構框理論的意涵。他們指出，能夠促成參與的構框需要指認出問題、提出解決方法、並且鼓舞士氣。因此，集體行動的框架有三項核心的元素，亦即是診斷框架（diagnostic frame）、預測框架（prognostic frame）、與動機框架（motivational frame）。診斷框架指認問題之所在，並且分析其原因或責任；預測框架指出解決方案與其相應的策略、對象；動機框架提出行動的終極理由，並且以道德呼籲的方式來召喚參與者的熱情（Snow and Benford 1988: 199-202）。

光是三種元素的存在並不一定保證動員的效果，好的構框仍是需要滿足其他條件。任何的社會運動構框都面臨了兩難情境，要強調問題嚴重性，還是鼓勵參與：如果不強化問題的急迫性，聽眾無法被喚起熱情，如果問題被描述為後果過於恐怖的、無法招架的，那麼會導致宿命論的態度（*ibid.*: 203-204）。更重要的，構框能成功發揮動員效果的關鍵，即在於能夠引發聽眾共鳴（resonance）。²

構框理論既然是處理社運組織內部的微觀動員，因此，構框的概念很容易就與認同連結在一起。理所當然的，如果某一個框架能夠成功地招募到支持者，他們之間也會形成某種關於自身、運動、對手的集體認

² 判定某個框架的共鳴效果可以有外部的與內部的標準。所謂的外部判準是指框架與外在的信仰體系之間的關係，包括了核心性、廣度與關連性。如果框架越能符合既有的價值觀，被接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另一方面，成功框架的內部條件包括了，框架與歷史事件的連結（經驗可信度（empirical credibility）），與一般生活經驗相符合（生活經驗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以及是否符合通行的說故事方式（敘事傳真性（narrative fidelity））（Snow and Benford 1988: 205-210）。此外，Benford（1993b: 692）則是另外添加了一項框架共鳴的判準，即其一致性。

知，並且劃定我群與他群的界線。在構框理論學者看來，認同形塑亦是構框過程中必要的一環。相對於其他解釋集體認同起源的研究途徑，構框理論認為微觀層次的互動是關鍵，反對將認同視為某種個體稟性或集體結構的產物（Benford 1993a; Hunt and Benford 1994; Hunt et al. 1994; Snow and McAdam 2000）。

構框理論的起初關切在於社會運動的招募問題，很顯然，這是繼承 Goffman 的微觀社會學旨趣。到後來，Snow 等人轉而處理更廣大的社會運動議題，並提出兩個處理組織層次的構框概念，亦即框架爭議（frame disputes）與主導框架（master frame）。在以往，社會運動聯盟中的路線歧異通常是以組織利益或意識型態來解釋；相對地，框架爭議的概念則指出，路線的爭議也可能是來自於構框形式的差異，例如溫和派與激進派分別以不同的方式來詮釋問題（Benford 1993b）。

主導框架的概念可以用來解釋這種現象：在某個時期，不同部門的社會運動組織具有某種程度的共識，以十分相近的方式來詮釋不同領域的不滿。Snow 等人指出，相對於個別社運組織所採用的特定框架，主導框架是同時存在於多種的社運組織或社運議題。Snow 等人採用了一個科學哲學的比喻：主導框架是全面性的、根本性的典範，而特定框架則是派生出來的理論（Snow and Benford 1992: 138）。就如同某些特定框架比較能喚起共鳴，引發聽眾的支持與同情，主導框架也有彈性與僵化的分別，前者容許多種延伸的可能，連結起更廣大的抗爭議題，例如權利訴求作為一種主導框架，在美國六〇年代的種族、性別、反戰運動中廣泛運用（*ibid.*: 139-140）。

除了解釋不同社會運動組織的框架親近性，主導框架也能夠與 Tarrow（1989）的抗爭週期理論連結在一起。在 Snow 等人看來，抗爭週期的開啓是與某種創新的主導框架出現有關，使得運動戰術有可能創

新，新的社運組織得以成形。抗爭週期早期出現的框架固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動員助益，但是對於後期出現的集體行動者而言，卻也形成了一定程度的限制。舉例而言，美國黑人運動早期是以民權作為主要訴求，但是這個主導框架就對於六〇年代後期更激進的黑權（Black Power）訴求產生了壓制的作用。其原因在於，黑權是訴求分離主義，而民權的構框卻是種族融合為前提（Snow and Benford 1992: 145）。最後，在抗爭週期的末期，主導框架的動員潛力也面臨了枯竭的窘境，它越來越不具有說服力，不再能夠喚起共鳴。一旦它被成功地駁斥與推翻了，社會運動的動員也隨之衰退（*ibid.*: 150）。

簡而言之，構框理論的提出原先是為了解釋社會網絡的動員效果，亦即民怨議題如何在微觀動員的脈絡下被重新詮釋。但是到了後來，Snow等人的理論化企圖心則更龐大，轉而探討其他運動面向的議題，構框的概念也被賦予更多的分析效用。然而，難道互動論的預設能夠承載如此多樣的解釋功能，而不產生理論上的衝突？Goffman的作品能夠解釋相對穩定的日常生活是如何維繫的，但是移植到充滿權謀與衝突的社會運動領域，是否會出現水土不服的現象？事實上，隨著構框概念的普及化，其他不採取互動論觀點的學者也開始使用這個詞彙，如此就產生了一些混淆與爭議。在此，本文試圖處理（1）構框與策略的問題及（2）構框與組織的問題。

關於（1）策略的問題，自從資源動員論興起以來，大多數學者都承認社會運動的意圖性，在其中參與者追求其集體目標。早期資源動員論學者為了強調策略理性的面向，甚至過度輕忽了意義與動機的重要性，針對這一點，構框理論適時提出了修正意見。儘管如此，Snow等人仍未妥善處理構框的策略性意涵。³對於Goffman而言，策略性行動只是日常生活中的一種形態，而不是全部。他所關切的問題在於，何種

日常經驗的組織使得這一類型的行動能夠產生，而不是試圖以策略性行動來解釋社會的秩序或衝突。但是對於社會運動研究者而言，策略的問題卻需要被認真對待。社會運動不是為了提出新觀點而構框，相反地，構框是爲了改變世界。

事實上，即使是純粹爲了形塑運動團體內部的共識，構框過程也是涉及了策略性的成份，充滿了各種隱藏、偽裝、佔有的權力運作。然而，正是由於 Snow 等人對於策略的探討不足，才引發後續的爭議。在一篇十分重要的文章中，McAdam 等人（1996: 5-6）提出了策略性構框（strategic framing）的概念。他們認爲構框可以被定義爲「一群人有意識的、策略性的嘗試，形成關於世界與他們自己的共同理解，以正當化與鼓舞集體行動」。很顯然，對於 McAdam 等人而言，構框的意義在於其策略性作用，而不只是純粹爲了溝通或建立共識。⁴

在此，本文贊同 McAdam 等人的主張，策略應該被視爲構框的核心要素。然而，要提出一套完備的策略性構框理論之前，互動論的理論預設需要徹底檢討。更重要的，構框概念要能夠用來解釋運動招募以外的

³ 舉例而言，在2000年文獻回顧中，Snow 等人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是他們卻沒有試圖提出解決方案。他們只是將策略視爲框架形成中的一個過程，其他還包括了論述過程與競爭過程。如此，策略是被貶爲構框的面向之一，而不是最根本的前提（Benford and Snow 2000: 623-627）。

⁴ 然而，問題卻出在於 McAdam 等人沒有發覺策略性的探討是與 Snow 等人的互動論預設有所抵觸，他們居然宣稱自己是要「回歸 David Snow 的原初構想」。關於這一點，Goodwin 及 Jasper（1999: 47-49）逮到了借題發揮的機會，他們指控 McAdam 等人涉嫌不實篡改，將 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賦予太多的策略性想像。基本上，Jasper（1997: 77）主張應該回到構框理論的原始意圖，只討論社會運動組織內部的溝通過程，避免使用這個概念來探討社會運動組織以外的文化現象，如此才能免於概念的過度負載，反而喪失了分析上精確性。

社會運動現象，而不是只侷限於 Snow 等人所處理過的範圍。本文第三節將探討策略性構框的若干問題。

關於（2）組織的問題，資源動員論的另一項貢獻，即是將社會運動視為有組織的政治行動，而不只是某種群眾行爲。因此，社會運動的研究應該以社運組織爲中心，探討其與其他組織之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在一開始，Snow 等人提出構框理論的時候，焦點放在微觀動員，因此，構框的作用被認爲是透過人際網絡形塑出共享的意義。到了後來，Snow 等人開始將構框放在更廣大的組織過程中來思考，提出了框架爭議與主導框架的理論。簡單地說，構框理論是從微觀動員發展到組織過程，但是在晚近，許多評論者認爲 Snow 等人的構框理論缺乏足夠的經驗證據支持，而且若干概念顯得過於抽象（Steinberg 1998: 847; Swart 1995: 468; Youngman 2003: 524）。舉例而言，在 Snow 等人看來，主導框架的分析作用是類似政治機會結構，可以用來解釋社會運動的抗爭週期變化。但是這樣的解釋容易流於某種形式的決定論，亦即社會運動的發展是受制於某個主導框架的動員潛力，而不涉及組織過程。

在此，本文同意構框理論應該多處理微觀動員以外的議題，分析社運組織與其他組織的互動（Cornfield and Fletcher 1998: 1306）。事實上，在九〇年代中期以後，這種取向的經驗研究作品十分豐富。在第四節中，本文將回顧這些作品，以梳理出共同的結論。

三、策略性構框

除了形塑出參與者的共識以外，構框仍有其他策略性的作用。用 Williams（1995）的話來說，策略性構框的概念意味著將文化視爲一種運動資源，可以被有意圖地操弄，以促成運動的目標達成。大致上來

說，回顧既有的研究文獻中，可以發現三種策略性構框的主要作用，亦即（1）利用政治輿論、（2）維持參與士氣、（3）減少反對阻力。簡單地說，這三種作用都是為了正當化運動的訴求。就這一點而言，Snow等人所重視的框架共鳴並不是唯一的判準，因為共鳴的效果主要針對支持者或是潛在支持者而言，而策略性構框卻不一定只是針對這些群體。

關於（1）利用政治輿論，從策略性構框的角度來看，政治機會結構不只是構成一組限制或促成集體行動的物質條件，同時也是帶來某種的輿論氣候，使得某一些類型的訴求容易被接受，而另一些類型的訴求被忽略或壓制。因此，面對變動中的政治局勢，社會運動的領導者也順應趨勢，以不同的方式來包裝自己的訴求。

晚近以來，這一類的作品不在少數。Cornfield and Fletcher（1998）探討美國勞工聯盟（AFL）的框架轉移時指出，在二十世紀初，美國工人運動是反對國家介入勞資爭議；但是隨著三〇年代新政（New Deal）的出現，國家開始積極推行各種管制措施，因此，工人運動開始利用這種政治氣候的轉變，要求各種的社會福利政策。Diani（1996）解釋義大利北部的民粹主義政黨之所以壯大，是因為他們提出的框架是符合九〇年代政治輿論的反體制聲浪。這些新右翼政治勢力成功地利用當時民眾的不滿，尤其是對於羅馬政府的無效率與主流政黨的腐敗。Schneider（1997）分析紐約市的波多黎各裔社區運動，發現社運組織的框架選擇具有高度的策略考量。因此，在波多黎各裔居多的社區，運動者強調族群的訴求；在種族混合的社區中，運動者則是提出階級或民權的訴求。Noonan（1995）解釋智利婦女運動的框架轉移，發現運動者靈活運用威權統治與民主化時期的政治輿論，以不同方式呈現婦女的主張。因此，在威權時期，婦女運動者要求國家立法保護女性的母職身份；在民主化

時期，女性的政治參與則是主要的訴求。同樣地，Hobson（1999）的研究指出，瑞典婦女運動也策略性地佔有、利用長期執政社會民主黨的口號，以要求更多的婦女權利保障。

這些例子都顯示，社會運動的構框並不一定直接反映了當事者的想法。在許多情況，某種訴求的提出是帶有機會主義的味道，純粹是爲了利用某種政治風向。

關於（2）維持參與士氣，很少社會運動能夠在短期間內實現目標，通常的情況是在最終勝利之前，運動參與者會經歷了一連串的打擊，因此如何在每次的挫敗之後，重新整理隊伍、維持參與士氣也成爲運動領導者的工作之一。從這個角度來看，構框的功能不只是將旁觀者轉化成爲支持者、支持者轉化爲參與者，另一項重要的作用也是在於維繫參與者的使命感，避免失敗所導致的軍心渙散。Einwohner（2002）與 Voss（1996, 1998）的研究，關切社會運動的失敗。他們指出，如果社運組織要維持成員長期的參與，避免失敗所帶來的悲觀主義與無力感，一個可行的方式即是發展某種「壯膽的迷思」（fortifying myth），以強化成員對於原有動機框架的效忠。很顯然的，這種壯膽的迷思即是一種維持參與士氣的框架，使得參與者相信失敗只是暫時的，下一次的參與是有可能成功的。

關於（3）減少反對阻力，社會運動的成功不只是寄望支持者的有效動員，也要避免敵對陣營的強力抵擋。社會運動的訴求是透過高度的文化符碼包裝，而不是參與者的意識型態、世界觀之直接表現。事實上，越是背離社會主流共識的社會運動主張，越是需要這種策略性構框。否則，即使社運組織能提出吸引支持者的框架，促成他們走上街頭，更強大的民意反彈仍會使他們徒勞無功。換言之，發揮正當化作用的框架並不一定是鼓勵參與的框架（Kubal 1998; Youngman 2003: 548）。

在許多保守派的反制運動中，這種情況特別明顯，反墮胎人士爲了因應女權運動所揭櫫的權利論述，創造出所謂的胚胎權（right of fetus），即是著名的例子。同樣地，九〇年代的美國種族隔離主義者表面上也不再宣稱優越論、仇視與暴力，而是借用多元文化主義的論述，來組織反對有色人種的白人（Berbrier 1998）。在同時，加拿大的保守宗教領導者也放棄傳統的神學與道德論述，而改用高度世俗化的文化權利論述，要求政府資助教會學校（Davies 1999）。在六〇年代，要求社區能夠控制學校的主張是黑人民權團體訴求之一，但是到了九〇年代，保守的衛道人士則用同樣的框架試圖干預學校課程與圖書館藏書（Naples 2002）。這些例子都顯示，隨著社會日益世俗化與平等化，保守派的構框需要利用自由派的修辭，而無法直接套用原先的傳統主義價值訴求。

另一方面，處於保守的年代，進步性的社會運動有時也採取這種形式的策略性構框，以避免招致更大的反對。在美國爭取幼兒托育運動中，Reese（1996: 571, 575）指出婦女團體採取了母職主義的（maternalist）框架，強調已婚婦女並不是不願意承擔原有的家庭角色，她們被迫要工作，因此需要政府協調托育。這種母職主義的論述沒有挑戰傳統的性別文化，因而減弱了父權主義的反彈。同樣地，在台灣八〇年代中期爭取墮胎權合法化的運動中，婦女團體也將「人工流產」的議題構框爲「保護不幸少女」，而不是「婦女的身體自主權」。根據顧燕翎（1996：162）的分析，其原因在於解嚴前不利的政治機會結構，迫使婦運領導者「以規避女性意識的迂迴方式，而能使極爲敏感的墮胎議題獲得合法化」。

因此，就利用政治輿論、維持參與士氣、減少反對阻力等作用而言，框架並不是爲了指認出某種不義，進而喚起原先不存在的參與熱情。相對地，這些構框往往帶有高度的策略性，在其中運動者的真實意

圖被隱藏起來，表面上所呈現的是某種修飾過後的版本。

四、組織間的構框過程

Snow 等人原先分析微觀動員的機制，他們高度借用 Goffman 對於面對面互動情境的分析，因此他們所重視的是人際層次的構框。但是後續研究者所重視的策略性構框則通常是以社運組織為主體，而且涉及了不同性質組織之間的互動。在這一節中，本文將回顧這些文獻，以釐清組織間的構框過程。在此，可以根據 Klandermans (1992: 95) 的建議，將社會運動的組織互動分為聯盟系統與衝突系統，因此，組織間的構框也可以分為 (1) 聯盟性的構框與 (2) 衝突性的構框。

關於 (1) 聯盟性的構框，社會運動的聯盟不只是一種物質資源的結合，不同的社運組織之間需要建立一套共同接受的訴求與詮釋觀點，以協調彼此的行動。Gerhards (1995) 指出，聯盟性的構框需要包含下列五種面向：(1) 尋找議題，並且將其定義為某種社會問題；(2) 找尋形成問題的原因；(3) 詮釋目標以及成功的機會；(4) 標籤化抗議的對象；(5) 將其自身正當化。任何進行聯盟運動的社運組織都需要在這些關鍵問題上取得共識，否則將無法採取一致的行動策略。在 Gerhards 看來，如果這五個面向越能緊密連結，那麼所發揮的動員能量將會發揮最大。

在許多聯盟性的運動中，為了容納更多的組織參與，構框的策略往往是尋找最大公約數，只能包括所有組織都同意的抽象原則，而不是具體事項。舉例而言，1994 年的四一〇教育改革大遊行提出要求小班小校、廣設高中大學、教育現代化、訂定教育基本法。由於這次盛大的遊行名義上是由 210 個社團所參加 (薛曉華 1996: 268)，因此為了協調出

可以運作的共識，工運團體放棄了工農子女學費補助的訴求，而教師團體同樣也不提出懲戒權的要求。⁵

事實上，在建構聯盟性的框架過程中，個別組織所擁有的資源與權力不盡相同，這些因素也會影響了構框的方向。在聯盟運動中，資源豐富的社運組織較能影響構框的過程，他們能夠將自己的意識型態、世界觀、運動路線加諸聯盟團體，進而主導了整體的運動走向（Croteau and Hicks 2003）。面對沒有抗爭經驗的社區居民，外來的社會運動組織有可能獲得主導權，因而改變了原有的動員框架（Futrell 2003）。

關於（2）衝突性的構框，除了聯盟系統以外，社運組織所處的衝突系統也會影響構框的內容。誠如Evans（1997）所指出，大部分的研究作品都認為構框是爲了社會運動的支持者與同情者，很少注意到構框也有可能是針對敵手的訴求。在此，敵手有可能是政府部門，或是社會運動要挑戰的對象，也包括反制運動。Noakes（2000）指出，政府單位也有可能對於挑戰者進行有意識的構框，甚至是蓄意的抹黑與醜化。

從衝突系統的觀點來看，不只是社運組織在進行構框，其對立者也從事反制構框，這就形成了一種相互競爭與對抗的論述情境（Haydu 1999; McCaffrey and Keys 2000）。事實上，一旦某個集體行動框架被成功地駁斥了，後續的社會運動就很難再採取相同的框架，被迫要尋找新的動員框架。根據Adair（1996）的分析，美國七〇年代反核運動繼承了六〇年代的非暴力直接行動（non-violent direct action）傳統，採取激進的抗爭策略。但是由於核電工業強力的輿論動員，使得直接行動的框架被等同於「不負責的嬉皮運動」與「無政府主義者」。後續的八〇年代反核運動者被迫採取較爲溫和的運動策略，不斷宣稱是代表美國主流

⁵ 訪談紀錄，前反高學費運動成員，2004/1/31。

派 (the middle America) 的立場，是一股理性穩健的中道力量。

最後，則是關於主導框架的理論。在 Snow 等人的架構下，主導框架是用來解釋抗爭週期的關鍵變項。在建構其理論過程中，Snow 等人是參考了 Tarrow 的政治過程論，因此，主導框架即是取代了政治機會結構的位置，抗爭的週期變化也被視為主導框架的後果。然而，這種主導框架的概念化是容易造成問題的。在此，本文認為，Snow 等人的理論另一項缺點在於忽略了組織動態的考察。由於直接借用政治機會結構的解釋模型，一旦忽略了運動擴散的中介機制，很容易落入文化決定論的陷阱，無法處理社運組織如何成為主導框架的創造者、繼承者，甚至是挑戰者。舉例而言，Snow and Benford (1992: 145) 強調先行的主導框架對於後續的抗爭產生了限制作用，阻礙其創新的可能性。但是在台灣的环境運動研究中，研究者卻發現先行的反核運動提出了政治化的動員框架，但是卻不妨礙後續運動者提出嶄新的社區化框架 (何明修 2003)。

在此，本文建議將主導框架視為組織層次的互動。因此，某個動員框架之所以是主導框架，其原因在於許多不同性質社運組織在同一時間採取了相同的認知架構，而不是源自於某種觀念性元素的內在力量。從組織的觀點來看，我們可以發現某種框架的普及化是涉及了組織之間的學習與人員的流動。McAdam (1988: 161-185) 的研究就指出，參與美國自由之夏 (Freedom Summer) 的大學生如何將民權運動的抗爭訴求帶進校園，以權利的論述來組織學生運動。六〇年代的學運世代在大學畢業後，繼續參與各種新左派運動。因此也將權利的術語帶進入環境、女權運動 (Meyer and Whittier 1994)、甚至是殘障者運動 (Groch 2001: 89-91)。同樣地，分析美國工會運動為何在九〇年代的重新復甦，Voss 及 Sherman (2000: 327-333) 指出關鍵性的原因之一在於具有社區運動、

民權運動背景的成員加入，他們傾向於將工會視為社會運動組織，而不是經濟利益團體。這些跨越不同社運組織的份子可以稱為「連結性運動者」(bridge activists)，他們的存在反映了一個相互重疊的社會運動社群，也因此能有助於動員框架的學習與擴散 (Isaac and Christiansen 2002: 727)。

從這些例子可以知道，主導框架之所以普及化，原因在於不同社運組織之間的相互學習與模仿，從而採取了一致的詮釋方式。因此，不應將主導框架視為某種無形的時代精神 (zeitgeist)，而忽略了更為基層的組織性因素。

五、策略理性的限制：過度志願論的危險

在承認策略性構框的同時，也要注意策略理性的限制。拒絕文化決定論的結果並非必得接受某種形式的文化工具論。簡單地說，文化可以作為運動的資源，這個事實並不意味著社會運動者可以將其任意使喚，隨意形塑成為自己想要的那樣。在最低限度上，文化因素具有其內部的邏輯，任何人也要遵照其規則，才能靈活使用。這種情形就像是修辭學與文法的關係，修辭是用語言來說服聽眾的藝術，但是這種藝術的可能性是建立在語言的規則性之上，換言之，唯有精通某一種語言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出現具有說服力的演講。

其次，運動者本身也是受制於一系列歷史的、傳記的、情境的限制，而不是隨心所欲地憑空捏造。任何的社會行動者都承繼了既定的歷史背景、社會位置，他們也與其他同時代的人分享一些未明言的、視為理所當然的文化預設。當集體行動者精心設計某種動員框架時，他們往往是將一些背景知識視為不用懷疑的前提，而專注於經營某些較局部性

的文化元素。舉例而言，自由主義政治文化當道下的美國，個人選擇被視為一個神聖而具有說服力的價值，因此，身體自主性的女權運動試圖將墮胎詮釋為婦女的個人選擇。同樣地，在一九八〇年代之後，美國新保守派人士試圖透過教育券（education voucher）的政策來推動教育私有化，他們所訴求的價值也是基於所謂的家長選擇（parental choice）（Dougherty and Sostre 1992）。儘管女權運動與新保守主義的意識型態南轅北轍，這些例子顯示了動員框架背後更廣大的文化背景，這些元素通常並不是行動者所能控制的。

因於這些理由，聰明有可能反被聰明誤，理性的行動往往導致非意圖的後果。晚近以來，不少評論者指出策略性構框研究所面臨的困境。Hart（1996: 95）認為，某些研究作品帶有過度的志願論（excessive voluntarism）的色彩，彷彿文化是可以由運動份子任意創造的。一種可能發生的危險即是，忽略一般民眾所共同的常識，將其誤認為社運組織有意識經營的框架（Moodie 2002: 57）。Goodwin及Jasper（1999: 49）舉例說明這種過度志願論思考的貧瘠：如果說Martin Luther King經常提到聖經，是爲了取得基督教徒的支持，那麼他用英文演講是否也是爲了討好美國人？

很顯然，構框的研究需要避免無謂的過度志願論，適度地賦予策略理性應有的位置。在此，本文主張策略性構框的研究應注意下列的三種條件：（1）行動者本身的限制、（2）文化脈絡性的限制、（3）失敗的策略性構框。

關於（1）行動者本身的限制，誠如Jasper（2002）所指出，社會運動中的策略是涉及了文化、傳記、學習等諸多元素。個體永遠是處於既有的社會脈絡，當事者不可能具有全面性的知識，理性也必然是受限制的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因此，運動幹部所處的社會位置以及他們

所擁有的社會經驗都會影響其構框的可能範圍。在一項關於美國農場工人運動的研究中，Ganz（2000）比較了在地草根社區工作者 Caesar Chavez 與美國勞聯產總（AFL-CIO）的動員策略，前者能夠針對移民農工的宗教文化特性，設計出具有說服力並且引發同情的框架，例如將移民社區的宗教節慶與抗議行動結合在一起。相對地，勞聯產總以往一向是專屬於白人勞工的組織，不理解移民勞工的文化特性。因此，他們採取了習以為常的官僚組織方式，以致於無法深入社區生活。在台灣八〇年代的環境運動興起過程中，早期生態學者所提出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並沒有引發出草根層次的運動。一直到地方人士結合了鄉土認同，提出「我愛鹿港、不要杜邦」的社區動員框架之後，名符其實的本土環境運動才真正誕生（何明修 2001）。

Mansbridge（1986）關於七〇年代平權修正案（Equal Right Amendment）爭議的經典研究則是呈現了另一種情況。平權修正案原本只是某種抽象性的原則宣示，並不一定會直接導致實質的、立即的改變。但是由於女權團體的參與者多半是職業婦女，她們直接經歷了工作領域的性別壓迫，因此傾向於將平權修正案詮釋為改變婦女經濟地位的關鍵（*ibid.*: 44）。如此，反而加深了保守派婦女的恐懼，以為更獨立的女性地位即是意味著喪失了種種的法律保護。一連串的反制動員最終使得這項改革功虧一簣。這些例子都顯示，策略性構框都是受制於行動者的生命經驗。當事者認為合理的動員策略並不一定能達成效果，原因在於他們往往誤認聽眾的處境是與他們一致，因此應該會產生相同的共鳴作用。社會運動份子並不是較不理性，或是缺乏資源，即使是有意識地進行構框，實際的狀況也與工具理性的理念類型有一大段落差。⁶

⁶ 根據蕭阿勤（2003）分析，一九七〇年代台灣黨外運動份子強調本土的歷史與認

關於（2）文化脈絡性的限制，任何的社會運動都是處於一定政治文化脈絡之下，這種更廣大的政治文化形成了某種的認知性與規範性的預設（Joppke 1992: 315）。相對於物質性的資源，觀念性的元素通常是彼此相互連結，構成一個更廣大的意義之網，很難被切割與拆解使用。更進一步來說，在任何一個政治文化脈絡中，所能容許的構框種類是有限的，社會運動組織並不是享有無限的自由度。在既定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下，人們所共同承認的正面價值是有限的，任何政治勢力為了正當化其主張，都要爭奪這些意義符碼。

因此，既有的文化可以被視為若干「構框劇碼」（framing repertoire）的集合，社運組織在其中進行策略性的選擇（Haydu 1999; Williams 1995）。構框劇碼的概念十分類似Gamson（1992: 135-136）所謂的「主題」（theme），亦即是社會運動所訴求的價值。在分析美國核能爭議的作品中，Gamson及Modigliani（1989）發現，進步、民主、成本、能源自主等主題是反核人士與擁核人士所爭議的重點。從這個角度來看，社運組織的構框並不是在毫無限制的條件下所進行的，他們的抉擇是有限的，但是這也不排除其他有創意的構框方式。

關於（3）失敗的策略性構框，在既有的文獻中，研究成功的策略性構框遠多於失敗的個案，很顯然成功的例子比較容易用來論證構框的

同，但是在他們的論述仍是沒有脫離國民黨政權的大中國民族主義敘事模式。針對這個現象，蕭阿勤（2003:241-242）反對採取純粹策略性與工具性的解釋，認為那只不過因為政治環境的不利，使得黨外人士不敢暢所欲言。他特別強調，黨外份子的成長是受到戰後政治文化局勢的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將國民黨的論述內化了（*ibid.*: 220-225）。在此，雖然蕭文著重的政治運動的政治敘事與認同，與本文的構框研究在理論取向上略有不同。但是蕭文的分析則是很細膩地指出，構框的策略理性是受限制的。

重要性。儘管如此，失敗的構框仍是具有啟發性，能夠指出策略理性的限制，以避免過度志願論的危險。根據Babb（1996）的研究，美國十九世紀中葉的紙幣主義（greenbackism）運動主張政府大量發行紙鈔，以製造有利於貸款者與生產者的通貨貶值。紙幣主義運動也試圖動員工人群眾，強調其階級利益是與資本家一致，都是屬於生產者，而不是不勞而獲的金融寡頭。但是由於工人們在日常經驗中所感受到的是階級對立而非和諧，因此，這種主張就被主流工人運動所揚棄了。十分類似地，民進黨在九〇年代初期曾經試圖以老人年金等社會福利議題來進行選票動員。但是由於議題的區隔性不明顯，動員效果有限，一般選民並不能判別不同政黨的福利政策立場。因此，到了1996年的總統選舉，民進黨又重新提出國家認同的訴求，放棄了先前的福利議題（傅立葉 2000）。從這些構框失敗的研究可以看出，運動者所精心選定的框架並不一定能發揮作用，策略性的思考也會遇到未意圖的結果。

一般而言，研究失敗構框的作品遠少於研究成功的個案。這個原因是不難理解的，在構框理論剛提出的當初，學者為了證明這個概念的解釋效力，傾向於選擇成功的社會運動例子，並且將成功的關鍵歸諸於構框的過程。這種研究設計固然能夠彰顯集體行動的意義面向，但是卻無法更精確地告訴我們，到底文化元素所能夠扮演的角色何在。因此，重視失敗的個案不但不是否定了文化的重要，相對地，反而由於側重構框的限制，才能使我們更「認真看待意義」。換言之，重視社會運動的意義面向，並不意味著文化工具論（文化符碼可以被任意操弄）或文化決定論（文化元素事先決定了社會運動的過程）。

總合以上的說明，在Snow等人原有的互動論架構下，構框的策略性成分並沒有被特意強調。後續的研究者傾向將構框放在策略性行動的觀點下來考察，這種概念性的突破的確更能豐富化構框理論的適用範

圍，能夠分析利用政治輿論、維持參與士氣、減少反對阻力等策略性目的。應該採取一種比較平衡的觀點來看待政治文化，文化即是提供集體行動一定程度的助益（enabling），同時也是某種的限制（constraint）。這種較持平的觀點可以避免過度志願論與過度決定論的雙重危險，也才能進一步擴展構框理論的研究。

六、結論

相對於其他導致社會變遷的力量，社會運動並不是無聲無息地產生其作用，而是喧嘩地帶來一套理解世界的新方式。如果不是透過集體行動的努力，性騷擾、家庭暴力、剝削、歧視等字眼不會成為我們的日常用語。社會運動的研究者需要重視這種文化的建構過程，分析形形色色的社運組織如何形塑我們對於日常生活的理解，如何質疑原本視為理所當然的事物，並且揭發虛假共識背後所隱藏的權力支配。在此，構框理論提供了一套十分可行的分析策略，原因在於這個理論將社會運動視為意義生產的主體，並且重視意義的傳播、抗衡、詮釋等過程。Touraine 將社會運動研究視為其行動社會學（actionist sociology）的核心，而不只是一個次領域，原因即是社會運動展現了社會自我生產的可能性，亦是所謂歷史性（historicity）的承載者。透過構框理論的視野，我們也能夠理解，為何社會運動成為當代文化創新的重要源頭之一。

本文回顧了構框理論所面臨的問題。首先，在 Snow 等人的原初設想中，構框是指涉微觀動員過程的共識形塑。構框概念的引用解決了 Snow 等人先前關於新興宗教的改宗與社會運動招募的一個研究困境，亦即到底社會網絡是如何產生作用的。構框過程指涉的是互動情境中的意義建構，使得參與者獲得了對於某個外在事物與自身的共同理解。然

而，由於 Snow 等人是以互動論的立場來思考構框理論，框架的主要作用被視為是透過人際網絡形塑運動共識。如此一來，即是使得構框的策略性與組織性面向沒有被充份討論。後續的研究者多半側重策略性構框與組織過程中的構框，但是卻忽略了 Snow 等人的互動論預設。

本文贊同構框理論應該擴展其研究範圍，納入策略與組織的考量。因此，構框除了形塑參與者的動機以外，其策略性運用更可以用來（1）利用政治輿論、（2）維持參與士氣、（3）減少反對阻力。這些作用並不是為了鼓勵運動參與，而是試圖正當化社會運動的訴求。從這個角度來看，策略性構框的概念強調文化的可塑性，容許多種的使用可能。然而，這並不是意味某種形式的文化工具論，認為觀念元素可以被任意操弄。合理的策略性構框研究應該避免這種過度的志願論立場，不應賦予策略理性過度誇大的作用。社會運動的理性是高度受限的，是受制於當事者的傳記背景、政治文化、構框劇碼等條件的限制。最後，相對於 Snow 等人對於微觀情境的研究，後續的研究者採取更廣大的視野，拓展了組織構框的研究。從組織互動的角度來看，構框可以是構成聯盟性運動成立的前提，另一方面，在對抗性的情境中，構框也有可能是不同組織之間爭執的焦點。此外，組織互動也可以解釋主導框架的運作，而不需要假設觀念本身的因果作用力。

作為一篇文獻回顧，本文只能從既有的研究作品中進行歸納與討論。本文試圖釐清目前存在的若干爭議，並且提出一些概念化的解決方案。無疑地，構框理論的價值是在於提供經驗解釋，就這一點而言，更精緻的理論分析則是有賴於更多的經驗研究成果累積。

本文強調構框理論應該多納入策略性與組織過程的研究，實質上也等於是主張構框理論與資源動員論、政治過程論進一步整合，而不是拋棄後者的研究成果，另外開拓一種創新的、但是無法與原有理論典範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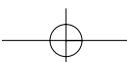
話的分析途徑。換言之，重視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並不意味著採取某種的文化主義的（culturalist）立場，認為觀念性元素具有封閉性，形成一個獨立自足的領域。文化具有相對自主性，有其特殊的運作邏輯，但是這個事實並不排除這種可能，文化符碼可以策略性地運用，也可以成為組織協商中的籌碼。社會運動研究者應該「認真對待意義」，但是這不代表利益、組織的探討就應該被拋在腦後。事實上，正因為現實生活總是摻雜了各種元素的成份，分析文化的與非文化的元素之互動也才成為社會學最具挑戰性的工作之一。

最後，Polletta 及 Amenta（2001）曾指出，社會運動的研究發展有一種不幸趨勢，各種新理論的提出往往被過度誇大，形成獨特的學派。如此一來，這些分析概念的定義不但是太過鬆散，無所不包，而且與原有的研究文獻也無法進行整合。在他們看來，資源、政治機會結構、組織、網絡，乃至於晚近興起的情緒等概念，都是面臨這種困境。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社會運動的研究其實不見得是如此分崩離析、各自為政。舉例而言，資源動員論從早期對於個體層次的利益、誘因討論，逐漸轉向人際層次的動員網絡，因而開啓了與其他研究途徑對話的可能。同樣地，政治機會結構的研究早期帶有強烈的政治決定論色彩，到後來也開始重視行動與結構之間的互動。基於同樣的理由，本文相信構框理論也經歷了相同的演變，隨著策略與組織議題的導入，社會運動的文化分析將會是與其他途徑的研究形成一種互補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



作者簡介

何明修，紐約大學富爾布來特訪問學人，南華大學應用社會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為社會運動、勞動政治與教育改革，研究作品見《台灣社會學》、《台灣社會研究季刊》、《台灣政治學刊》。



參考書目

- 何明修，2001，〈台灣環境運動的開端：專家學者、黨外與草根（1980-1986）〉。《台灣社會學》2: 97-162。
- 何明修，2003，〈自主與依賴：比較反核四運動與反美濃水庫運動中的政治交換模式〉。《臺灣社會學刊》30: 1-49。
- 傅立葉，2000，〈老年年金、政黨競爭與選舉〉。頁232-256，收錄於蕭新煌、林國明編，《台灣的社會福利運動》。台北：巨流。
- 蕭阿勤，2003，〈認同、敘事與行動：台灣1970年代黨外的歷史建構〉。《台灣社會學》5: 195-250。
- 薛曉華，1996，《台灣民間教育改革運動：國家與社會的分析》。台北：前衛。
- 顧燕翎，1996，〈婦女運動與公共政策的互動關係：墮胎合法化和平等工作權策略分析〉。頁151-174，收錄於徐正光、蕭新煌編，《臺灣的國家與社會》。台北：東大。
- Adair, Stephan, 1996, "Overcoming a Collective Action Frame in the Remaking of an Antinuclear Opposition." *Sociological Forum* 11(2): 347-375.
- Alexander, Jeffrey C., 1998, "The Computer as Sacred and Profane." Pp.29-46 in *The New American Cultural Sociology*, edited by Philip Smi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abb, Sarah, 1996, "'A True American System of Finance': Frame Resonance in the U.S. Labor Movement, 1866 to 1886."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 1033-1052.

- Benford, Robert D., 1993a, "You Could Be the Hundredth Monkey: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and Vocabularies of Motiv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4(2): 195-216.
- Benford, Robert D., 1993b, "Frame Disputes within the Nuclear Disarmament Movement." *Social Forces* 71(3): 677-701.
- Benford, Robert D. and Scott A. Hunt, 1992,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 *Sociological Inquiry* 62: 36-55.
- Benford, Robert D. and David A. Snow, 2000, "Framing Proce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An Overview and Assessment."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6: 611-639.
- Berbrier, Mitch, 1998, "'Half the Battle': Cultural Resonance, Framing Processes, and Ethnic Affectations in Contemporary White Separatist Rhetoric." *Social Problems* 45(4): 431-450.
- Calhoun, Craig, 1993,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Science History* 17(3): 385-427.
- Cohen, Jean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663-716.
- Collins, Randall, 1982, *Sociological Insight: An Introduction to Non-Obvious Soci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ornfield, Daniel B. and Bill Fletcher, 1998,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on Social Movement 'Frame Extension': Shifts in the Legislative Agenda of 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1881-1955." *Social Forces* 76(4): 1305-1321.

- Croteau, David and Lyndsi Hicks, 2003, "Coalition Framing and the Challenge of a Consonant Frame Pyramid: The Case of a Collaborative Response to Homelessness." *Social Problems* 50(2): 251-272.
- Davies, Scott, 1999, "From Moral Duty to Cultural Rights: A Case Study of Political Framing in Education." *Sociology of Education* 72(1): 1-21.
- Diani, Mario, 1996, "Linking Mobilization Frames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Insights from Regional Populism in Ital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1(6): 1053-1069.
- Dougherty, Kevin J. and Lizabeth Sostre, 1992, "Minerva and the Market: The Sources of the Movement for School Choice." Pp. 24-45 in *The Choice Controversy*, edited by Peter W. Cookson, Jr. Newbury Park, CA: Corwin Press, Inc.
- Einwohner, Rachel L., 2002, "Motivational Framing and Efficacy Maintenance: Animal Rights Activists' Use of Four Fortifying Strategy."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3(4): 509-526.
- Evans, John H., 1997,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and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 Frame Content: The Religious Pro-Choice Movement." *Sociological Inquiry* 67: 451-469.
- Fireman, Bruce and William A. Gamson, 1979, "Utilitarian Logic in the Resource Mobilization Perspective." Pp. 8-44 in *The Dynamics of Social Movements: Resource Mobilization, Social Control and Tactics*, edited by Mayer N. Zald and John D. McCarthy. Cambridge, MA: Winthrop Publishers.
- Futrell, Robert, 2003, "Framing Processes, Cognitive Liberation, and NIMBY Protest in the U.S. Chemical-Weapons Disposal Conflict."

- Sociological Inquiry* 73(3): 359-386.
- Gamson, William A., 1992, *Talking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amson, William A. and Andre Modigliani, 1989, "Media Discourse and Public Opinion on Nuclear Power."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5(1): 1-37.
- Ganz, Marshall, 2000, "Resources and Resourcefulness: Strategic Capacity in the Unionization of California Agriculture, 1959-1966."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4): 1003-1062.
- Gerhards, Jürgen, 1995, "Framing Dimensions and Framing Strategies: Contrasting Ideal- and Real-Type Frames."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34(2): 225-248.
- Giddens, Anthony, 1987,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ffman, Erving, 1974, *Frame Analysis: An Essay on the Organisation of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 Goodwin, Jeff and James M. Jasper,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1): 27-54.
- Groch, Sharon, 2001, "Free Spaces: Creating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in the Disability Rights Movement." Pp. 65-98 in *Oppositional Consciousness: The Subjective Roots of Social Protest*, edited by Jane J. Mansbridge and Aldon Morri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Gusfield, Joseph R., 1981, *The Culture of Public Problems: Drinking-Driving and the Symbolic Ord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Hart, Stephen, 1996,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Social Movements: A Theoretical Reassessment and Literature Review." *Sociology of Religion* 57(1): 87-100.
- Haydu, Jeffrey, 1999, "Counter Action Frames: Employer Repertoire and the Union Menace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Social Problems* 46(3): 313-331.
- Hirschman, Albert O., 1982, *Shifting Involvements: Private Interest and Public Action*. Oxford: Blackwell.
- Hobson, Barbara, 1999, "Women's Collective Agency, Power Resources, and the Framing of Citizenship Rights." Pp. 149-178 in *Extending Citizenship, Reconfiguring States*, edited by Michael P. Hanagan and Charles Tilly.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Hunt, Scott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4, "Identity Talk in the Peace and Justice Move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22(4): 488-517.
- Hunt, Scott A., David A. Snow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4, "Identity Field: Framing Processes an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ovement Identity." Pp. 185-208 in *New Social Movements: From Ideology to Identity*, edited by Enrique Laraña, Hank Johnston and Joseph R. Gusfield.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Isaac, Larry and Lars Christiansen, 2002, "How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Revitalized Labor Militanc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67(5): 722-746.
- Jasper, James M., 1997,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Jasper, James M., 2002,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llective Action: Looking for Agency in Social-Movement Dilemma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02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Meeting,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 IL, U.S.A., August.

Jasper, James M., 2003, "Globalization and Agency: Compatible Terms? The Dilemma of Futurism in Social Science." Paper presented at Regional Conference of Research Committee 47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Social Classes and Social Movement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 Tokyo, Japan, July 3-4.

Joppke, Christian, 1992, "Expla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s of Two Anti-Nuclear Movements: A Political Process Perspective." *Sociology* 26: 311- 331.

Klandermans, Bert, 1988, "The Formation and Mobilization of Consensus." Pp. 173-196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ume 1)*,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Hanspeter Kriesi and Sy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Klandermans, Bert, 1992,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rotest and Multiorganizational Fields." Pp. 77-103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Klandermans, Bert, Hanspeter Kriesi and Sydney Tarrow, eds., 1988,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ume 1)*.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Kubal, Timothy J., 1998, "The Presentation of Political Self: Cultural Reso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9(4): 539-554.
- Mansbridge, Jane J., 1986,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1988, *Freedom Summ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1996, "Introduction." Pp. 1-20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ited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2001,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cCaffrey, Dawn and Jennifer Keys, 2000, "Competitive Framing Processes in the Abortion Debate: Polarization-Vilification, Frame Saving, and Frame Debunking."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1): 41-61.
- Melucci, Alberto, 1996,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Meyer, David S. and Nancy Whittier, 1994, "Social Movement Spillover." *Social Problems* 41(2): 277-298.
- Moodie, T. Dunbar, 2002, "Mobilization on the South African Gold Mines." Pp. 47-65 in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and Belinda Robn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aples, Nancy A., 2002, "Materialist Feminist Discourse Analysis and

-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Mapping the Changing Context for 'Community Control'." Pp. 226-246 in *Social Movement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State*, edited by David S. Meyer, Nancy Whittier and Belinda Robnet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oakes, John A., 2000, "Official Frame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The FBI, HUAC, and the Communist Threat in Hollywood."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4): 657-680.
- Noonan, Rita K., 1995, "Women Against the State: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ollective Action Frames in Chile's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Sociological Forum* 10(1): 81-111.
- Polletta, Francesca and Edwin Amenta, 2001, "Conclusion: Second That Emotion? Lessons from Once-Novel Concepts i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Pp.303-316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Jeff Goodwin,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Reese, Ellen, 1996, "Maternalism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How California's Postwar Child Care Campaign Was Won." *Gender and Society* 10(5): 566-589.
- Schneider, Cathy, 1997, "Framing Puerto Rican Identity: Political Opportunity Structures and Neighborhood Organizing in New York City." *Mobilization* 2(2): 227-245.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88,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Pp.197-217 in *From Structure to Action: Comparing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across Cultures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Volume 1)*, edited by Bert Klandermans,

- Hanspeter Kriesi and Sydney Tarrow. Greenwich, CT: JAI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1992, "Master Frames and Cycles of Protest." Pp.133-155 in *Frontiers in Social Movement Theory*, edited by Aldon D. Morris and Carol McClurg Mueller.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ow, David A. and Doug McAdam, 2000, "Identity Work Process in the Context of Social Movements: Clarifying the Identity/Movement Nexus." Pp. 41-67 in *Self, Identity,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Sheldon Stryker, Timothy J. Owens and Robert W. Whit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Jr. and Sheldon Ekland-Olson, 1980,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Movements: A Microstructural Approach to Differential Recruitment."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5(5): 787-801.
- Snow, David A., Louis A. Zurcher, Jr. and Sheldon Ekland-Olson, 1983, "Further Thoughts on Social Networks and Movement Recruitment." *Sociology* 17(1): 112-120.
- Snow, David A. et al., 1986, "Frame Alignment Processes, Micromobilization, and Movement Particip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4): 464-481.
- Steinberg, Marc W., 1998, "Tilting the Frame: Considerations on Collective Action Framing from a Discursive Turn." *Theory and Society* 27(6): 845-872.
- Swart, William J., 1995,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Irish Question: Master Frames, Cycles of Protest, and 'Master Frame Alignment'."

- Sociological Quarterly* 36(3): 465-481.
- Swidler, Ann, 1986,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2): 273-286.
- Swidler, Ann, 1995, "Cultural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Pp. 25-40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ited by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Tarrow, Sidney, 1989, *Democracy and Disorder: Protest and Politics in Italy 1965-75*.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 Touraine, Alain, 1977, *The Self-Production of Society*, translated by Derek Coltma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Voss, Kim, 1996, "The Collapse of a Social Movement: The Interplay of Mobilizing Structures, Framing, and Political Opportunity in the Knights of Labor." Pp. 227-258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Opportunities, Mobilizing Structures, and Cultural Framings*, edited by Doug McAdam, John D. McCarthy and Mayer N. Za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oss, Kim, 1998, "Claim Making and the Framing of Defeats: The Interpretation of Loss by American and British Labor Activists, 1886-1895." Pp.136-148 in *Challenging Authority: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Contentious Politics*, edited by Michael P. Hanagan, Leslie Page Moch and Wayne te Brak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Voss, Kim and Rachel Sherman, 2000, "Breaking the Iron Law of Oligarchy: Union Revitalization in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6(2): 303-349.

Williams, Rhys H., 1995, "Constructing the Public Good: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al Resources." *Social Problems* 42(1): 124-144.

Youngman, Nicole, 2003, "When Frame Extension Fails: Operation Rescue and the 'Triple Gates of Hell' in Orlando."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32(5): 521-554.